

信孚文化
教育叢書

主編 信力建

◎ 孙玉祥 著

广州出版社

知识的忧伤



◎ 孙玉祥 著

广州出版社

知识的忧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的忧伤 / 孙玉祥著.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9.10

(信孚文化教育 / 信力建主编)

ISBN 978-7-5462-0046-0

I.知… II.孙…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 181159 号

书 名	知识的忧伤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87 号广建大厦 9-10 楼,邮政编码:510635)
责任编辑	杨珊珊
责任校对	陈 斌
装帧设计	谢婷婷
印 刷	广州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20 千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62-0046-0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 序

学术文化需要积累，我们有志略尽绵薄。信孚文化教育丛书由是面世。

我们的追求非常简朴：

第一、理性。

极端激发的是情绪，读之犹如嗑药；付诸行动，收获的是灾难。理性的诉求是冷静、平实，下笔有根有据。

第二、新意。

陈言务去。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第三、责任。

首先要对自己负责。文字是学养和品德的体现，千万别在自己脸上擦黑。

其次要对读者负责，不要浪费他人的时间——生命。

归根到底要对社会负责。

阅世渐深，深知社会的自由、稳定是个人生存和国家繁荣的不二法门，而其不可或缺的保障是法治与民主。此外，人的需要多种多样，美，爱，善，清新地呼吸，舒畅地说话，永不满足地好奇和探索，安全、自在地享受当代的成就……文明人有的，中国人也应该有。

总之，告别中世纪，实现现代化是当代中国人的使命；为此浇花、除草都能写就好文章。

我们的力量很小，期盼您的理解，支持，帮助！



2010年3月15日

目 录

总序

不怕知识分子	(1)
才子的错误	(5)
吹牛大王	(8)
出名与出书	(11)
玩儿名的年代	(15)
化名自吹	(18)
看了书名不买书	(23)
文人揭短	(25)
当抄袭被揭露以后	(30)
知识分子最怕什么	(35)
恐惧下的“作品”	(39)
权势与文章	(42)
食不食“周粟”	(45)
从严，还是从宽？	(48)
真假知识分子	(52)
客气，还是直率？	(56)
夸什么	(59)
“我听别人说的”	(64)
千古学人伤心语	(69)
那年头弄文字	(71)
郭沫若的“慧眼独具”	(74)
回首惘然	(77)

小说与现实	(80)
其人为何	(83)
咬人与被咬	(87)
“老不读《三国》”	(89)
该不该读寓言童话	(92)
耻与为伍	(94)
名人扯谎的麻烦	(96)
把书捐给谁	(101)
不上电视不出镜	(104)
送书，还是不送？	(108)
文坛诛心 自取其辱	(112)
自传是什么玩意儿？	(119)
拔高两例	(122)
文言文平议	(127)
官员·学者·作家	
——两起在小说中使用真人名字事件之比较	(132)
翻译不翻译	(139)
王元化与钱锺书	(141)
如何读钱锺书的信？	(146)
谁在“轻薄为文”？	
——答马斗全	(150)
何物马斗全	(154)
我看余杰骂钱锺书	(157)
如何透析钱锺书	(162)
“不审势”的究竟是谁？	(166)
大文人的胡说八道	(170)
自恋的“记忆文学”	
——评余秋雨《借我一生》	(172)
感谢余秋雨	(178)
胡乔木遭遇的两次尴尬	(180)
王蒙·诺奖·鲁迅	(183)

梁晓声星运谈	(185)
小波的伟大	(189)
二月河与太阳	(193)
何不良之有?	(196)
何曾有误	(199)
才子捧佳人	(201)
谁的败笔?	(204)
为什么总是无中生有?	(209)
脐下文章	(212)
“无口才”乎?	(215)
署名说	(218)
对待盗名	(220)
互相吹捧与易子而食	(222)
我看“主席抄袭”	(226)
无谓的“研究”	(228)
吃人的嘴软	(230)
也说李煜及其死	(233)
“袁氏当国”，唐氏秉笔	(240)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	(243)
书屋中的天火	(246)
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	(249)
抄·炒·造	(252)
沙河有金	(256)
视野与窗口	(259)
尔曹与江河	(261)
未曾失踪的思想者	(263)
他们也是中国人	(265)
政统·道统·学统	(267)
“我见”之我见	(270)
并不“非常”的“档案”	(274)

不知死，焉知生？	(277)
沉重的现实	(279)
此中有真意	(281)
革命中的王后	
——评茨威格《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	(284)
鸿渐何处	
——重读《围城》	(286)
另半张脸	(288)
桃李劫	(291)
星沉海底当窗见	(293)
不废江河	(296)
大海总有波涛	
——重读《汤姆叔叔的小屋》	(299)
别具慧眼 一针见血	
——读《缀石轩诗话》	(301)
买书的错误	(303)
蒙汗药？还是大杂碎？	(305)
子虚乌有的“天下无敌”	(308)
别怕伟哥	(312)
细微处见精神	(315)
真诚的虚无	
——读《麦田守望者》	(317)

不怕知识分子

读书人或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是有些叫人生畏的角色。因为这种畏惧，我们常常把他们看作神奇的人物，并因此留下许多近乎神话的说法——比如“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之类。就连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一代天骄”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3月22日的讲话提到知识分子时也曾这么表示：“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我也有一点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有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很少，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227页）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他们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学问。我们对无知的东西，总是心存畏惧。所以，从理论上讲，要消除这种对知识的畏惧，最彻底的办法是：你自己也好好努力，将别人脑海中的知识化为己有，无知变为有知。如此这般后，自然会大生不过如此的感觉，还会有什么畏惧？不过，这也是纸上谈兵，实际上，知识积累，有一个漫长积累，并非夕发朝至一蹴而就；更何况，你就是有了这个过程也不一定成功——因为还需要天分，否则，历史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书呆子了。也就是因为这个“正常渠道”很多人没时间走或没办法走，而心中又十分想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畏惧，甚至反过来，叫知识分子畏惧自己，怎么办呢？有办法。

一个是打下去。你知识分子不是自以为有了知识就地位崇高，别人只能望你项背而无法平视么？那我现在就把你打成“资产阶级”，把你置于被消灭对象；戴你高帽，拔你白旗；把你由座上宾变为阶下囚，由香馍馍变成臭狗屎。这一来，看你还有什么值得牛逼的？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货色，当然也就没

有什么值得畏惧的了。这是过去爱用的办法。在上面提到的那篇讲话中，毛主席就这么道：“现在情况，已有所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指陈伯达关于厚今薄古的演说——笔者），一封信（指陈伯达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笔者），一个通知（指当时批准下达的一个通知——笔者），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恳工作好，但统治宇宙的胆子小了。有许多同志在资产阶级目前精神不振，没有想到消灭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算什么？要灭掉你的。几次运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相当多的人无动于衷。如批判胡适、梁漱溟、《武训传》、丁玲、胡风等。本来，消灭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228页）这法子似乎是说：比笔杆子我比不过你知识分子，那我跟你比枪杆子如何？这当然不成问题：枪杆子下（所谓“消灭”），原先还在知识宝座上耀武扬威，自我感觉良好的知识分子们，马上狼奔豕突溃不成军。也曾经历过这样一个“消除知识畏惧”的梁漱溟据说就写了这样一首诗来描写这一过程：“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假如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游。”这种消除知识权威，打掉自己对知识畏惧的方法应该是很有效的：到“文革”后期，中国人民一提到知识分子，心中涌现的绝对不是历史上的崇敬畏惧，什么“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之类，而是蔑视鄙视敌视——“知识越多越反动”！方法虽然奏效，但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却也叫人无法承受，那就是“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如果一个国家还想不至于崩溃，好歹混下去的话，这套“快刀斩乱麻”的消除知识畏惧法显然不能在“按既定方针办”下去。

这样就到了“新时期”。新时期当然就不能靠把知识分子打下去来赢得“九天之下，唯我独尊”的良好自我感觉了——且不说，这一来，崩溃在即；就冲那新字，我们也不该旧戏重唱。所以，在新时期，知识分子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虽然还算不上“座上客”，可到底已不是“阶下囚”了，不好随便说打倒就打倒。不过，还是有些人对知识分子

的特殊身份（拥有他所不具备的知识背景）念念不忘，心存畏惧。怎么办呢？于是便有了新法，曰“钻进去”。

这个办法也很简单：你知识分子不自诩精英阶层，高高在上么？现在我不打倒你，不但不打倒你，我还钻进去，成为你的一员：我也成知识分子了，我还怕你——怕我自己——么？这种方法的具体实施过程就是：知识分子有学历，于是阿狗阿猫也有学历；知识分子有职称，于是阿狗阿猫也有职称——还常常比你的高。你有的这些硬件我都有，我凭什么怕你？我有的权力或财富你还没有，你倒该怕我！

就拿知识分子最高身份教授来说吧。记得我念大学那会儿（八十年代初期），我们那所三千多人的本科学院也就一两名正教授，十多名副教授。而他们的水平也的确了得——不要说教授了，就是副教授，他们上课的风度与水平与讲师比起来，那的确不是一个档次。只要有教授或副教授上课，那教室注定给挤得满坑满谷水泄不通。而讲师上课呢，课室可就七零八落矣。那时，教授在我们口中与心中都象征着博学、才华与一言九鼎！也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在读到一些回忆文章讲那个有名的吴宓先生在临终前口中念念有词的不是升天前的祈祷，也不是对人世间的最后忏悔，而只是非常自豪地讲“我是吴宓教授”这一点特别理解——那时，我们不少同学的最高理想也是临终前自己也能像吴宓一样，很自豪地讲：我是某某教授！可，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名词太好了，大家都喜欢，于是人人去争，尤其是一些不三不四而又手握大权的人念兹在兹，非把这“小家碧玉”变成他的“姨太太”（用现在话来讲叫做“二奶”）不可，争来抢去，终于争抢出了“博士满街走，教授不如狗”的“喜人”局面：现在大学里面，教授真是多得如狗乱窜——你在教室里碰到的固然是教授，你在院长办公室碰到的也是教授，甚至你在后勤处财务处宣传部这些跟学术跟学生没什么关系的衙门里碰到的还是斗大的字认不了一车的“教授”！所谓“处长教授”、“副处长教授”与“科长教授”一时满天飞舞，搞得真正教授对自己弟子愤言：“别叫我教授。现在，什么玩意儿都叫教授！”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多了就不值钱。于是我们就看见有“教授”因机构改革下了岗到中学

应聘，结果反而没有聘上的；也有医学“教授”无照开业，做起了江湖郎中卖野药，最后给工商部门查禁的；当然，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个连自己北大函授文凭都是从地摊上买来的大贪官、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居然也是几所江西大学的“客座教授”！现在，我们要在听谁说他是什么教授，别人怎么样不知道，反正我是绝不会像当年我念大学时那样对他肃然起敬了——我要是“敬”了一个大贪官怎么办？教授这好名词现在是给他们糟践得一钱不值的了，至于什么博士硕士之类学位，就更不在话下了。你如果有心去统计一下在位的县级以上干部的文凭，就会知道这东西有多不值钱！总之，这学历与职称到今天，已经像当年那科举考试一样，成了藏垢纳污贪污腐败之所。语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有了这么多“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冒牌“教授”、“博士”、“硕士”，知识界也就成了一团漆黑的大染缸，还有哪个傻子会对它肃然起敬呢？

对知识和知识拥有者传播者的敬畏，这正是我们人类日趋进步的动力。消除了这种敬畏，我们只能在一塌糊涂中苦苦挣扎——这或许就是我们不怕知识分子历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才子的错误

人都会犯错误——不会犯错误的那是上帝。不过，虽然都会犯错误，可因为人与人不同，所以犯错误的情况也就不一样。譬如，没有文化或文化较低的人犯错误，那错误往往一目了然，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错在何处，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可才子就不一样的：因为他是才子，所以他犯的错误就不那么直截了当，而是曲里拐弯，我们要知识储备不足的话，一时还真难看出才子这错误是“何所闻而来”，又是“何所见而去”；而一旦搞清后呢，我们又常常会拍案：真不愧是才子！我们不妨来看些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八十年代初，我念大学时，有一次我去问我们班长——他应该算班上的一个才子了，就因为他是才子，我嫉妒他，才常常找些鸡毛蒜皮的问题问他，好叫他出乖丢丑，把才子的称号让给我——这一次我问的问题不复杂：“你说《拍案惊奇》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对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应该不成问题——教科书上都有呢。可那时我们刚入学，还没学到这一章。所以，才子不知道。要一般人，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没什么丢人的——学问之海这么大，要什么都知道了，那才是怪物呢。可我们班长是才子，这才子就得跟一般人不一样（否则，何以叫才子？），所以，他虽然不知道，可还是气壮山河地给出了答案：“朱自清！”听了他这答案，我险的没有跌破眼镜：这明朝的凌濛初，怎么会和这现代的朱自清混在了一起？这三个字既不同音，字形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这风马牛他是怎么弄到一块儿的？我把正确答案告诉他后，请教才子他是为什么错得这样乱七八糟叫人摸不到魂头的，才子先是一怔——显然是没想到自己错了；接下来是一阵大笑——可能是弄清了自己错误的原因。

可，就是不肯把自己为什么错得这样花枝招展的原因说出来。后来我琢磨了一番，才把他的错误曲里拐弯琢磨出来：原来这才子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标兵，所以一听到我问他《拍案惊奇》，就想起毛主席著作《别了司徒雷登》中有“面对手枪，闻一多拍案而起……朱自清誓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名言。“拍案而起”与《拍案惊奇》虽说不是一回事，可也差不多。问题是他又把闻一多的“拍案而起”，记到了后面朱自清的头上，就这么在他才子曲里拐弯的脑海里一搅和，这《拍案惊奇》的作者就成了“朱自清”！从这个例子，我们或许可以看出：才子犯错误，往往错得匠心独运与才华横溢！如果上面这个例子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我们就再来看看另外两个例子。

大才子余秋雨在他的名作《文化苦旅》中有一名篇叫《家住龙华》。在这名篇中的“篇后附记”这么写到：“公元978年，北宋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风雨骤至，但在朦胧中只见岸边草莽间有一种奇怪的光在闪耀，而且还隐隐听到钟梵声，钱俶常忙问这是什么地方。随从人员告诉他这是古龙华寺的地基，早成废墟。钱俶常觉得这天晚上上天对他投下了启示和期待，立即下令重建，这就是至今塔砖塔基上能找出那个年代印记的原因罢。”这段文字写得生龙活虎，也看不出什么毛病。可，读过新、旧《五代史》或《宋史》的人就会疑惑：那位从五代末年到北宋初年割据东南一方的吴越忠懿王叫“钱俶”，而不是什么“钱俶常”，余秋雨怎么会硬要来个狗尾续貂呢？哪怕你读过不少史书，对此恐怕都会不明究竟——就跟当年我要没有读过“毛主席著作”，我就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拍案惊奇》的作者会是“朱自清”一样。不过，好在这世上还有读书人，上海的金文明先生就东翻西翻，从康熙年间释道渊所撰的《龙华志》中找到了这样一段：“按知太史院事叶清臣记略云……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风雨骤至，草莽间祥光烛天，钟梵隐然，询其地。古龙华寺基也。遂令大盈庄务将张仁泰资金重建。”这才搞明白了：原来余秋雨在读了这一段记载后，搞不清楚这忠懿王到底是“钱俶”，还是“钱俶常”——后来一琢磨：若讲做“钱俶”则后边的“常”字不通（实际上是通的，

通“尝”)，于是就认定此公当为“钱俶常”！（见金文明：《石破天惊——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205页）狗尾由此续貂！像这样搞不清楚就想当然，而且当然得这么理直气壮，除了才子，孰能为之？

还有一个例子是小说家二月河。在他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第十四回中，写到这么回事：说三个皇子为了测试大才子邬思道的才华，便出对子给他对，这姓邬的端的了得，什么都难不了他。比如，皇子胤禵出的是“此木为柴山山出”，而邬思道出口对道：“由水变油日日冒”。这看了让人觉得奇怪：因为“日日”叠在一块儿并不是“冒”字；而且，“出”是入声，“冒”也是入声，不能相对。更要命的是：这“此木为柴山山出”的下联是“因火成烟夕夕多”，这应该是非常常见的——我读初中时（八十年代初），念黎汝清的革命小说《叶秋红》中，就写到过这副对联。二月河为什么不顺手牵羊，拿人家原来这个还对得上的对联写上，而偏偏弄过不伦不类的“由水变油日日冒”呢？一般人恐怕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后来，有人查了这本书的出版日期，知道此书初版于1991年6月，而完稿于1990年4月。联系当时的时事，终于闹明白：原来，在二月河写这书的时候，正是哈尔滨一个叫王洪成的大骗子宣称他能用水变油，而又为无知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之际。二月河对这弥天大谎信以为真，正好又记不住人家原来的下联，就弄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由水变油日日冒”来塑造自己心目中的才子——结果，才子自然给他描得一塌糊涂，他自己也给描得一塌糊涂。不过，旁人要弄清楚他何以犯这样的错误的原因，那还真不容易。你说是不是？

钱锺书在《围城》中讽刺那些把诗写得根本不通的才子：“他不是老实安分的不通，他是仗势欺人，有恃无恐的不通，不通得来头大。”这话用余秋雨的话来作解释，就是：才子就是犯错误也犯得意味深长。

吹牛大王

人生在世，自吹难免。我的一个哥们在自吹受到我们攻击之余，他的口头禅是：“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的人，又没有人来吹我，当然只好自己吹自己了。”乏如阿 Q，也会“我祖上比你阔，你是什么东西”地自吹自擂一通。不过，就我看来，在各色人等中，最会自吹自擂者，还真非文人莫属。这道理也很简单：阿 Q 者流，吹来吹去，也只知道拿自己那并没有说服力的祖宗来吹；可文人就不一样了，他博古通今知晓天下，吹起牛来，那可真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用来给自己垫脚涨价的人或事，可谓俯拾皆是，美不胜收。文人王充在《论衡》里有“儒者之言，溢美过实”的说法，也真算是夫子自道了。我们不妨来看些例子。

南社诗人林庚白写诗有“隐约乳头纱乱颤，惺忪眼角发微披”、“乍觉中间湿一些，撩人情绪裤痕斜”之语，被今人评为“是真名士本色，不滞于物，英雄胆略，至今无匹”。（见《缀石轩诗话》）这诗算不算“至今无匹”，我不敢说；但他自我吹牛倒恐怕不愧这四个字。在他的《丽白楼诗话》中，他这么老实不客气地评价自己诗道：“十年前，郑孝胥诗今人第一，余居第二；若近数年，则尚论今古之诗，当推余第一杜甫第二，孝胥不足道也。浅薄少年，哗以为夸，不知余诗实尽得古今之体势，兼人人之所独专，如元稹之于杜甫。而余之处境，杜甫所无，时与势皆为余所独擅，杜甫不可得而见也。余之胜杜甫以此，非必才力凌铄之也。余五言古体诗，奄有三百篇、魏晋唐宋人之长；五七言绝句，则古今唯余可与荆公抗手；五七言律诗，则古今唯余可与杜甫子美齐肩；盖皆以方面多，才气与功力又能并行，故涵盖一切。”看了他这番“自我介绍”，让人禁不住想起台湾作家李敖那

番“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却为我供了牌位”的吹嘘。不过，李敖虽然牛，也只牛到在五百年内称雄霸道的地步；而我们这位林诗人，则从诗三百一直称雄霸道到郑孝胥——几乎就是五千年来第一！要论吹牛，台湾的李敖还真须退避三舍。当然，这种“自我介绍”的可信度有多大，我就不去说了——要想仅凭“隐约乳头纱乱颤，惺忪眼角发微披”的诗句成为古今第一诗人，似乎也还有些难度。

有意思的是，他们南社诗人似乎都是些牛皮大王——比如柳亚子：重庆谈判时，因为毛泽东对他持礼甚恭，将自己写的《沁园春·雪》给他欣赏发表，还顺手给他灌了一些诸如“先生之诗慨以当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之类的米汤，柳亚子马上欣喜若狂，引毛泽东为知音：不仅在民主人士中对毛泽东赞赏不已，还雄赳赳的写和词表示要与毛泽东“共上天入地，把握今朝”！这还不算，他还做诗说什么“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狂得好像当年曹操“煮酒论英雄”时对刘备所言：“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在论及诗歌水平时，他更是当仁不让地自吹：“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支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牢什子置诸脑后了。这样，收束旧时代，清算旧体诗，也许我是当仁不让呢！”换句话说，在政治方面，毛泽东或许能与我并驾齐驱；可要说到诗词歌赋，他怕还要让我一头——“一代文豪应属我”！而在柳身后遗下的满满两抽屉印石图章中，随手捡拾几枚就能找出像“亚洲卢梭”、“列宁私淑弟子”、“佯狂屈正则（原）”、“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这样的牛皮。当然，柳亚子似乎更愿把自己和政界大老在一块儿比较，还说他们跟自己比起来，不过是“小儿”，这跟林庚白专门与自己同行（古今诗人）较劲比起来，似乎要更让人接受一些。不过，他们拉人垫底，以吹其牛的做法，却是一样的。你也不妨假设一下：这两个“古往今来我第一”的牛皮大王碰到一块儿，那将是怎样